

认知识解视角下政治隐喻英译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为例

高文成, 王永玉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从认知识解视角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政治隐喻的英译, 考察其英译文背后反映出的认知机制。研究发现: 认知识解视角的四个维度——详略度、聚焦、突显和视角对该书中政治隐喻的英译均产生重要影响; 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背景的人们认知识解方式不同, 译者应灵活调整认知识解方式, 以达到特定的翻译目的; 本国的意识形态、发展理念、国家形象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都是政治文本翻译的首要考量因素。该研究有助于人们从认知识解这一视角理解翻译活动, 并为政治隐喻翻译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认知识解; 政治隐喻翻译; 认知识解转换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6-0510-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1119569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s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Construal

GAO Wencheng, WANG Yongy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s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construal and explore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for their transl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construal—specificity, focusing, prominence and perspective, are crucial for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s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Due to the different cognitive construal mechanisms of read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or ethnic backgrounds, translators can adjust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political texts, translato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readers' ideolog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osophy, national imag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is study helps to promot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construal,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political metaphor.

Keywords: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cognitive construal;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 cognitive construal transformation

当今世界,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至关重要的。胡作友等指出, 讲中国故事, 传中国声音, 翻译是必经之路。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 更是文化的交流^[1]。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类外宣政治文本的翻译研究, 既有研究不少, 如: 胡芳毅从操纵理论视角出发, 指出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不容忽视, 要把国家意志放在第一位^[2]; 王梓晗立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 认为功能语言学是研究显化翻译的一个切入点, 语言文化差异、文本类型和译者个人选择等原因都会促使译者采用直译加注、解释性翻译、意译和补充翻译等方式进行显化^[3]; 周珂等则从目的论视角出发, 指出政治文本的外译应具有外宣功能, 从而加深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识和理解,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4-5]。对政治文本中政治隐喻的翻译研究有: 彭爱民指出外宣文本中的中国特色政治隐喻热词的英译, 应采取打破文化自恋策略和文化替代策略, 在话语不断求新求变中, 通过译者的认知努力, 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 以达到凸显“创译”的目的^[6]; 张蕾对政治话语隐喻化翻译进行社会认知研究, 发现绝大多数隐喻化翻译都基于中英文化共享的人身体验和对外部事物的普遍认知, 容易为读者接受和理解^[7]。更多的隐喻翻译相关研究聚焦在政治文本中的隐喻模式及其翻译策略, 如: 朱晓敏等和王季芸提出了三种隐喻翻译策略, 分别是在目标语中保留原文本的源域、使用目标语中的源域来代替原文本中的源域以及丢弃原文本中的源域, 辅之以对原文目标域的解释^[8-9]。

以上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文本、政治隐喻的语言特点及其翻译原则和策略, 较少有研究从认知识解这一视角出发研究隐喻翻译背后的潜在认知机制, 即缺少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因不同认知而产生不同语言表达的分析。陈璐指出,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 在语言中无处不在^[10]。本研究将基于认知识解理论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政治隐喻的翻译, 解析中西方不同的认知思维方式和译者的认知翻译过程, 为政治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一、认知识解理论与隐喻翻译

英语中的“识解”(construe)一词, 在《朗

文当代英语辞典》(1987)中的定义为: “to place a particular meaning on (a statement, action, etc.); understand or explain in a particular way.” 识解要么是赋予一种语言表达或行为等特定或独特的意义, 要么是以一种特定或特别的方式去理解或解释。识解一方面产生意义, 另一方面也探寻意义。按照 Geeraerts 等的观点, 只要谈到意义, 就无法不涉及识解, 识解和意义形影不离; 一种意义就是一种识解方式, 一种意义就是对一种识解方式的选择^[11]。Langacker 认为语言系统为各种各样的识解提供方式^[12]。识解指人们具有用不同方法认识同一情景和事物的能力。Langacker 还将认知识解归纳为具体性、焦点化、突显和视角四个维度^[13]。这四个维度是解释语言结构成因的重要机制, 也为语言表达的差异性提供了解释渠道。

Lakoff 等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4]一书中, 开创性地将隐喻看作是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 认为隐喻能够帮助人们通过简单、具体的事物来理解复杂、抽象的概念。由此, 对隐喻的研究也迈向了认知领域。翻译与识解的关系密不可分, 翻译就是一种识解。就翻译识解的四个维度而言, 在进行政治隐喻翻译时, 由于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 难以实现具体性上的对等; 焦点化在语言中的体现突出地表现在“图形/背景”(figure/ground)这一认知结构中。认知语言学用“图形”表示突出的部分, “背景”表示衬托部分。就中国特色的政治隐喻而言, 中英两种语言在表达特定含义时, 语言结构体现出各种不对称性, 这些不对称性实际上就是突显问题。视角与翻译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翻译中他者视角的选取。丁国旗提出除了人们所处的时空位置所具有的视角之外, 还有一种建立在人们的知识、信仰和态度之上的视角^[15]。在翻译中, 尤其是对政治隐喻的翻译, 译者要注意转换翻译的视角, 以达到翻译中最大化地靠近意义的本真。因此, 译者在翻译时需要灵活转换识解机制。

二、认知识解视角下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政治隐喻英译分析

文旭等认为识解的不同方式产生不同的意义, 不同的意义决定不同的语言表达^[16]。即使是相似或

相同的意义,由于识解方式不一样,也会有不同的语法句式表征。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翻译极具文化特性的政治隐喻时,由于中外不同的识解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侯学昌等指出原文表达方式的语义内涵、蕴含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等方面的特点,需要译者整体把握并做出妥当的转换或保留^[17]。因而作者需要结合接受环境的阅读期待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灵活运用认知识解的各个维度,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符合译文读者的期待。以下将从具体性、焦点化、突显和视角这四个认知识解维度具体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政治隐喻的英译。

(一) 具体性

具体性(specificity)是指说话人用不同的精确度和细节对同一情景进行描写的属性。文旭等认为由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翻译中要做到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在具体性上的完全对等是很难的,尤其是在不同语系中语言间的转化,需要详细度的互化,即详化略或略化详^[16]。

例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译文 We should never halt our efforts to improve the Party's style of work.

“在路上”这一说法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常用的“道路隐喻”。这一表达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中国读者能轻易捕捉到这句话的内涵。但英语国家的读者缺乏中国读者这种特有的认知背景,所以译者应该转换识解方式,进行识解重构,这就需要详细度的互化,将“在路上”详细表达。如果不对“在路上”进行解释,而仅将其直译为“on the road”,则英语国家的读者将不能理解其内涵。译者可通过识解重构,采取略化详的翻译策略用“should never halt our efforts to...”表达中文“在路上”的内涵,这才符合译语读者的认知习惯。

例2 要不断增强向体内病灶开刀的自觉性。

译文 We should constantly enhance our will to tackle deep-rooted problems.

例3 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译文 No foreign country should expect China to accept anything that is damaging to China's own interests.

“病灶”指一个局限的、具有病原微生物的病变组织,也就是机体上发生病变的部分。“向体内病灶开刀”也就是指从根源处去解决问题。“吞下苦果”这一佛教用语指承担一个坏结果。译者在处理这两处隐喻的翻译时并没有对其进行直译,因为中外读者认知识解背景不同。“向体内病灶开刀”的英语直译表达非但不利于外国读者把握该表达的本质内涵,还会导致外国读者认为其较为恐怖和血腥,令其对中国文化感到费解,不利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因而译者充分考虑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识解机制,相应采取了具体性维度下详化略这一翻译策略,将原文中细颗粒度的描述“向体内病灶开刀”和“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转化成“tackle deep-rooted problems”和“accept anything that is damaging to China's own interests”这一英文中粗颗粒度的描述,便于译语读者阅读和接受。

(二) 焦点化

Langacker指出通过语言表达,人们可以进入概念世界的特定区域^[13]。文旭等认为,焦点化(focusing)包括为语言表征而进行的概念内容的选择以及为概念内容选择所描述的区域,这两方面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前景与后景的关系^[16]。焦点是被注意的区域,在语言中突出体现在“图形/背景”这一认知结构中。译者在进行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政治隐喻翻译时,应该综合考虑双方不同的认知识解方式以及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等,从而相应地调整或保留原文中所体现的焦点化内容。

例4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译文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material and cultural progress...

在例4关于政治隐喻的翻译中,原文中的“图形”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背景”为“协调发展”,而在译文中译者将“协调发展”调整为“图形”,即将“coordinated development”作为译文句子的焦点。这一处理更加强调了中国追求发展协调性,向世界彰显协调与和谐是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理念的重要方面,既考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充分尊重原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传达的政治意图。

例5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译文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building world peace.

例5中的隐喻表达“建设者”,表达了中国在

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发挥的作用。但在该词的英译过程中,译者并未将“建设者”译为“builder”,而是译为“participate in building world peace”。该译文把“建设者”,即中国做出的努力、采取的行动看作图形,把“世界和平”看作背景,更强调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这符合中国在国际上积极作为同时又保持谦逊姿态的现实。因为中国一贯主张为国际社会默默做出贡献而非过于强调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再加上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这一译法也使得那些故意诋毁中国的言论无机可乘。该译法充分考虑政治文本传播中国治国理念和树立中国正面形象的意图,转化认知识解方式,转换了语言中“图形/背景”这一认知结构,产生了符合文本意图的译文。

(三) 突显

语言结构体现出各种不对称性,这些不对称性实际上就是突显(prominence)问题。突显主要有侧显和基体两个维度。王寅认为,一个词语的基体就是它能在相关的认知域中所涉及的范围,这是意义形成和理解的基础;与其相对的是侧显,是基体内被最大突显的某一部分^[18]。所以同认知过程一样,译者在翻译时不可能兼顾到整体的各个部分,当突显和强调某一部分时,必定会造成对其他部分的压制。

例6 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译文 Hu Jintao emphasized, “The tree of art thrives only when our writers and artists place the people above everything else in their minds, always stand by the people, an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in their works”。

在对例6政治隐喻进行翻译时,原文和译文中突显的内容不同。原文中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达到“艺术之树常青”这一结果,原文中突出达到这一结果的过程和方式;而译文把对“艺术之树常青”的翻译放在前面,先强调结果,这样翻译较为符合英语国家读者的认知习惯和阅读期待。更重要的是,政治隐喻的外译关注超越语言之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译文突出了大

众文化发展取得的成果,传达了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大众文化的政策,也表明中国推动国内艺术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有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宽松多元的文化环境,打破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固有偏见。

例7 “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译文 We have pledged to “be a good blacksmith in forging good tools”。

例8 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

译文 The interests of ordinary people are hurt more by the “flies” that buzz around than the “tigers” that are far away.

例7中原文突显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庄严的承诺,而译文中的“have pledged”一词及其使用的时态,则相对压制了对这一承诺本身的强调,更加突显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所作的努力,向世界彰显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提升,不断努力发扬自身先进性的优良品质。例8中译者充分考虑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民生的高度重视,重视中国政府对最广大人民权益的关怀,以及向世界宣扬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权益的国家形象,再结合英语表达突出结果这一语言表达特点,将原文进行了识解转换,突显出人民的权益受到影响,从而达到很好的翻译效果。

(四) 视角

视角(perspective)是指人们观察认识事物所采取的时空位置角度以及所持立场和态度。吴淑琼等认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应考虑选择从读者或作者角度诠释原文,此行为的实施突出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19]。文旭等指出,世界上所有的翻译都是翻译者根据自身的理解、体验和态度将自己的认识观和价值观强加于源语文本^[16]。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要从视角的多样性出发,尽可能不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对源语文本的理解。

例9 第三,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译文 Third, we must uphold the principle that all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英语是形合型语言,汉语是意合型语言。英语注重句子的显性结构,即注重使用连接词和主从复

合句连接句子,具有“主谓”的行文逻辑;而汉语则强调隐性句子内部语义连接,注重心领神会,不追求外在形式的完整性。例9的翻译,考虑到政治文本的外宣功能,即宣扬中国政府法律政策的内涵,以及中国人民在共同推进法制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再结合汉英两种语言表达视角的不同,译者从西方读者的认知视角和认知解学习惯出发,为原文补充了一个主语“we”,不仅增强了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更是对国际上那些攻击中国民主法制不健全论调的有力回击,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减少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

例10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译文 *We still face severe challenges and a complex situation in our efforts to enhance Party conduct, uphold clean government, and fight corruption.*

例10中的译文同样做出了认知解转换,采取参与者的主体视角,显化了主语“we”。此外,该例中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两处隐喻的翻译也没有局限于原文固有的表达习惯,没有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主体视角,而是把“人”作为主体视角,增加了“人”这个主体的动作——“enhance”“uphold”和“fight”,强调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进行廉政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旧困难重重。译文中这一认知视角的转换,既增加了译文的亲切度,又宣扬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更美好中国的实际行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勤劳勇敢、团结一心美好品质的政治意图,有利于让世界了解更加立体全面的中国。

三、结语

在认知翻译学观照下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更是思维和认知机制之间的互相转换。本研究从认知解视角下的四个维度——具体性、焦点化、突显和视角分别考察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政治隐喻的英译。研究发现,政治隐喻极具民族特有的文化性,因而在外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要把不同民族的不同认知解机制作为重点考量,尤其是政治文本的外译一定要充分考虑该译法是否有利于树立本国国家形象、传播发展理念

和意识形态以及是否有利于对外输出本国思想文化。因此,可从具体性、焦点化、突显和视角等各个维度对源文的认知解进行调整或转换,提升政治文本外译质量,树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 [1] 胡作友,戴林杉.《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语用分析[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0(4):313-319;327.
- [2] 胡芳毅.操纵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政治文本翻译的改写[J].中国科技翻译,2014,27(2):40-42;39.
- [3] 王梓晗.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中的显化翻译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 [4] 周珂.从目的论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文本翻译[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
- [5] 陈思汗.目的论视角下政治外宣翻译的日译策略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为例[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0.
- [6] 彭爱民.外宣文本中的中国特色政治隐喻认知翻译研究——以“打虎”“拍蝇”“猎狐”为例[J].翻译研究与教学,2021(2):15-22.
- [7] 张蕾.政治话语隐喻化翻译的社会认知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文为例[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28(5):66-76.
- [8] 朱晓敏,曾国秀.现代汉语政治文本的隐喻模式及其翻译策略——一项基于汉英政治文本平行语料库的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36(5):82-86.
- [9] 王季芸.基于中西国家领导人政治语篇语料库的概念隐喻比较及翻译策略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
- [10] 陈璐.认知视角下主题隐喻的翻译研究——以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为例[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4):359-365.
- [11] GEERAERTS D, CUYCKENS H.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2]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下转第520页)

- 因[J]. 对外传播, 2016(11): 57-59.
- [4] 张璐. 从Python情感分析看海外读者对中国译介文学的接受和评价: 以《三体》英译本为例[J]. 外语研究, 2019, 36(4): 80-86.
- [5] 卢冬丽, 邵宝. 《三体》在日本的生态适应——英日间接翻译与汉日直接翻译的交叠[J]. 中国翻译, 2021, 42(6): 95-102.
- [6] HERMANS T.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 [7] 廖七一. 翻译规范及其研究途径[J]. 外语教学, 2009, 30(1): 95-98; 103.
- [8] TOURY G.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 Jerusalem: Academic Press, 1980.
- [9]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10]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 24(1): 19-24.
- [11] 喻旭东, 傅敬民. 翻译规范本源性概念的中国诠释[J]. 外语研究, 2022, 39(2): 66-70; 89.
- [12] 刘慈欣. 三体[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 [13] LIU C X. The Three-Body Problem[M]. LIU K, trans. Beijing: China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Import & Export Corp., Ltd, 2014.
- [14] 李红霞. 刘宇昆助推中国科幻文学“走出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7-26(007).
- [15] 王运鸿. 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J]. 中国翻译, 2013, 34(3): 5-14; 128.
- (责编: 朱渭波)

(上接第514页)

- [13]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4]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5] 丁国旗. 认知语法视角下的意象分析与翻译[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16] 文旭, 肖开荣. 认知翻译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7] 侯学昌, 卢卫中. 认知识解视角下中国政治文本英译研究——以《十九大报告》英译为例[J]. 东方翻译, 2019(4): 18-24.
- [18] 王寅. 什么是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19] 吴淑琼, 杨永霞. 认知识解视角下《红楼梦·葬花吟》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对比研究[J]. 外国语文, 2020, 36(5): 119-126.
- (责编: 朱渭波)